

史钧 以东方视角梳理人类文明



■ 记者 田莹

在科普圈,史钧是辨识度极高的作者。生物学博士、高校教师、进化论深耕者三重身份叠加,让他跳出大众科普单薄的知识输出框架,写出了一系列兼具硬核科学与人文温度的作品。

他说自己性格内向、社交能力极差,但聊起进化论,那些被他反复打磨过的观点便如流水般倾泻而出。从2010年出版的《进化!进化?达尔文背后的战争》到刚刚面世的《超级物种: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》,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,早已成为读者心目中“中国写进化论写得最好看的作家之一”。

在天涯论坛发帖 杀入进化论赛道

提到读书,史钧回忆起这样的场景:下地割猪草时,他在背篓里塞一本书,闲暇时便坐在地上读。有时读得太投入,忘了割猪草,回家就要挨骂。可第二天出门,背篓里照旧带着书。他的父亲在村小学教书,母亲不识字。家里有一个旧木箱,塞满闲书,有历史书、地理书和小说,甚至还有了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。

和闲书一样勾魂儿的,是大集上跑江湖卖艺的鼓书艺人。“我有时为了听完一段鼓书故事,还会逃课。”史钧回忆道。收音机里播放《岳飞传》和《杨家将》,他也听得如痴如醉,听完后自己还要重说一遍,“不管是在放学路上、在田里割猪草时,还是在灶台烧火做饭时,我总会喃喃咕咕地说个不停。”他爱给小伙伴们讲故事,除了听来的,还有些是自己顺口胡编的,小伙伴们都听得入神。

史钧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,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语文课代表,参加过县里的作文比赛。他心里藏着一个念头:长大要当作家。转折发生在高中分文理班时,“由于我讨厌死记硬背地理名词和历史时代,于是选择了理科。”他说。

读博期间,史钧在实验室里合成人工多肽,要测试它们能否封锁细胞表面的受体、阻断病毒入侵。体外实验做出来,有一定抑制效果,但离临床应用还有一段距离。旁人眼中这段科研经历看似无果,史钧却从中收获了两套支撑科普写作的核心能力。

第一是文献阅读的底子。他大量翻阅外语文论和长篇综述,从分子层面去理解生命的运行逻辑。“只有看懂生命最小单元的运作规律,才能从根源上理解物种演化的整套逻辑。”后来他写《进击的病毒》,当年密密麻麻的论

文,重新“活”了过来。

第二是对知识传播的认识。那是在2005年,网络文献检索刚刚推行,查资料不再受图书馆馆藏限制,海量的高水平综述唾手可得。史钧渐渐想明白一件事:科研应该挖掘新知识,但把已有的知识梳理清楚、传播出去,也同样重要。

博士毕业后,史钧到安徽科技学院(现安徽科技工程大学)教书,开设了一门与进化论有关的公选课。在收集资料准备讲义的过程中,他发现进化论思想有着巨大的魅力。他将教案稍作整理,发布在天涯论坛上,得到网友的支持,这成为他科普写作的起点。

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·道金斯的《自私的基因》,奠定了史钧关于进化论的科普写作基调。他早年在论坛连载的文字锋芒毕露,带着鲜明的论战风格。“那时我是野路子,怎么爽就怎么写,为了把读者勾住,什么猎奇的标题、嬉笑怒骂的口吻都敢用。”他说。

这批网文集结成他的第一本科普著作《进化!进化?达尔文背后的战争》,于2010年出版。2015年,“罗辑思维”创始人罗振宇买下该书版权重新打磨,更名为《一本书读懂进化论》,再度推向市场。又过了五年,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编辑陈俞倩联系史钧,商议该书再版事宜。史钧修订书稿:一方面增补前沿研究内容,另一方面收敛早年尖锐的论战口吻,打磨文字,文风变得沉稳和平。他说:“现在再让我写那些为了博眼球而牺牲准确度的段子,我也写不出来了。”新版定名为《其实你不懂进化论》,同样受到市场的追捧。

科普文章必须准确 趣味性是锦上添花

很多人觉得科研和科普是两条路,科研是“做”的,科普是“写”的。史钧对这类声音并不陌生,他打过一个比方:“科研是挖井,从一个点位向下挖,越挖越深;而科普是锄地,越锄面积越广,很少深挖。简而言之,科研是‘点’,科普是‘面’,点面结合,会起到更好的科学传播效果。二者并非对立关系,而是硬币的两面。”

他也承认,现实中确实存在重科研、轻科普的倾向。“对此我有过强烈的自我怀疑,甚至感到焦虑和彷徨。”但他最终还是与自己和解了,“科普有益于社会,符合高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,是值得认真做好的事情。既然如此,那我就认真去写好了,至于如何评价,完全可以交给读者定夺。”

谈到科普文章的写作技法,史钧自嘲是“文学的外行”,可他偏要用最苛刻的文学标准来打磨文字。一篇文章,他习惯先逐字改五六遍,再读出声来。“默读很容易忽略细节,只有念出来,哪个句子拗口、哪里逻辑不通,才能一清二楚。”他近乎强迫症一般追求语言的平衡感,“科普必须准确,趣味性是锦上添花,不能本末倒置。我以前是‘重通俗、轻严谨’,现在倒过来了。”

他陆续出版了《疯狂人类进化史》《鬼故事都是骗人的:惊悚灵异诡怪背后的科学真相》《爱的进化:两性博弈的逻辑》《进击的病毒》等科普书籍,探索不同的内容、尝试不同的风格,并努力将生命的进化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

起,以期最大程度引起读者的共鸣。直到《超级物种: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》出版,让他的写作达到了一个高峰,他说:“那是我对人类命运的一次集中思考,也是对科普写作技法的一次集中演练。”

让史钧感到意外的是,自己的作品被纳入小学语文配套阅读书目,他的读者圈从成年人延伸到了青少年。这让他刷新了认知,并开始主动调整创作思路。他说:“过往我的创作多以成年人为目标读者,部分内容并不适合青少年阅读。后来我专门创作了语句轻松、自带散文质感的《生命的颜色》,配合青少年的阅读习惯。科学知识本无严格的年龄边界,只要表达方式足够温柔、足够通俗,就能让大人与孩子一同读懂科学的美好。”

一边是站在讲台授课的高校教师,一边是伏案写作的科普作家,两种身份切换,史钧做得十分从容。课堂上,他专心教书育人,从不刻意推介自己的作品;只有在下课后,他才会用通俗的文字让高冷的知识出象牙塔。“我的两个身份是相互成就的,也希望我的文字既有专业的底气,又有治愈人心的温度。”他说。

东方的文明脉络与变迁 在人类进化中不该缺席

对史钧而言,进化论不单是一套理论,更是一种看世界的方法。“进化论帮助我建立起强大的自然观,用自然规律去分析自然、理解自然,而不再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去解释问题。另外,依靠客观规律分析生活现象,也让我的内心更加坦然和自信。”

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——男性的肤色往往比女性的肤色更深一些,这就是雌雄二态性,其原因正是来自进化论:“与男性相比,女性需要生育后代,而生育后代需要吸收更多的钙。为了吸收更多的钙,女性的身体要合成更多的维生素D。为了合成更多的维生素D,就要得到更多的紫外线照射,因为紫外线是人体合成维生素D的必要条件。所以,女性不得不减少皮肤中的黑色素沉淀,以此减少对紫外线的屏蔽,皮肤自然就会更白。”

在史钧看来,“累赘理论”也是最能展现进化论思维魅力的理论。雄性孔雀繁复笨重的尾羽、大角羚夸张的巨角,为什么在进化过程中会保留下来?累赘理论对此的解释是:雄性动物用累赘性状向雌性动物传递夸张的信息,“就算我身上带有这么多的累赘,照样能生存,因为我的身体足够强壮。”因此,累赘特征又被称为“诚实的信号”,成为雌性选择雄性的参考标准。史钧将这一理论加以延伸,“例如,埃及金字塔就存放遗体而言并无实用价值,却是统治者彰显实力、稳定族群的‘社会累赘’。”

《物种起源》自1859年问世以来,教材的简化科普让多数人都习惯性地认为,进化就是不断地变复杂、变聪明,而忽略了其本质是物种动态调适,既有进阶演化,也存在合理退化。史钧一直在努力纠正大众的片面认知,引入红皇后假说、中性演化、性选择、间断平衡等理论,以通俗的笔触拆解专业概念,力求打破大众对进化论的误解。这份扎根基础、深耕细作的积累,为他的新作埋下了伏笔。

今年,在北京鼎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

理高连兴的推动下,史钧突破舒适区,出版了《超级物种: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》。在过去的作品里,他像一个严谨的博物学家,稳稳站在生物学这块基石上,用自然的尺子丈量万物。而这次,史钧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他不想再写一本进化论科普,而是要跳出自己划定的小圈子,用东方的视角,把人类文明从头到尾重新讲一遍。

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的《人类简史》曾经红极一时,作者以西方视角审视人类进化,而在史钧眼里,这套叙事有着明显的缺憾,“不是说它不对,而是不够完整。我们有自己的文明脉络,有自己的演化逻辑,在这一领域不该缺席。”凭着多年来对人类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持续观察,史钧决定补上这一空白,写一本属于东方视角的人类演化著作,把微观的生命规律延伸到宏观的文明进程之中。



史钧

科普作家、生物学博士。著有《其实你不懂进化论》《进击的病毒》《爱的进化:两性博弈的逻辑》《超级物种: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》等作品。

“人类首先是哺乳动物,其次是灵长类动物,最后才是社会性动物。人类所有文化、社会特征,都能在动物演化规律中找到源头。人类文明从来不由神秘力量造就,而是自然选择长期作用的结果。”这是贯穿《超级物种: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》全书的核心观点,也是史钧打通生物演化与文明演化的关键所在。在他的叙事中,人类文明的迭代、社会制度的变迁、族群形态的演变,皆可追溯至客观的演化规律,无一处虚妄,无一丝偶然。

他把考古、历史、人类学、经济、政治各领域的素材,全部收拢到统一的叙事链条中,链条的终极逻辑是:维护群体稳定——远古的狩猎本能、族群制度的分化、从夫居习俗的由来、部落间的博弈、文字律法的诞生,每一次变革、每一种特质,说到底,都是维系族群存续的演化选择。

深耕科普创作多年,史钧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清醒且谦逊的认知。在他看来,那些作品的侧重点各有不同,有的重视知识深度,有的重视思考广度。而他最想做的是,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,把知识传递给大众。

对话史钧

文明没有标准答案 进化自有规律可循

记者:在您看来,当前我们的科普生态还存在哪些问题?

史钧:最近几年,国家推出许多促进科普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,对于宏观的科普生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但对个人而言,我仍有压力,特别是随着短视频等新媒体对阅读时间的侵蚀越来越明显,长篇幅科普写作的压力自然越来越大。如何促使人们投入系统阅读和深度思考,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,也是对科普创作者的考验。

记者:您如何应对“碎片化科普”?

史钧:我所能做的,只有用作品说话,继续深挖主题,认真打磨文字。相信系统阅读和深度思考仍是部分人群的刚需,长篇科普写作至少还可以坚持几年吧。此后我会考虑将部分作品做视频化处理,但目前还不会放弃写作。

记者:您对现在年轻人“文理兼修”有什么建议?

史钧:年轻一代接触的资料太丰富,选择的空间太大,远超出我的理解范围,所以我也不敢给什么建议。但我想大面积的系统阅读总是没错的,毕竟书籍是人类知识的精华,是生活智慧的结晶。我们从书籍中得到的东西,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人生,让我们的内心更加丰富,面对挑战时也更从容。如果说看短视频就像嗑瓜子,那么系统阅读就像在吃红烧肉,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精神享受。只要我们享受阅读,自然就有了“文理兼修”的底蕴。

记者:如果不做科普写作,您会做什么?或者说,科普写作之外,您最大的兴趣是什么?

史钧:如果不写科普文章,我可能会写历史小说,特别是关于隋唐更替之际的英雄故事。那是我童年时受到鼓书影响的结果,至今仍令我难以割舍。我写过好几个历史小说的草稿,但都被我强行打断了。我逼迫自己,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科普写作中去,不能随意胡思乱想,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。幸好我对科普写作充满兴趣,否则我的生活将十分枯燥。

记者:请您用一句话推荐《超级物种: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》这本书。如果挑选书中您最喜欢的一段话作为对读者的“告白”,您会选哪一段?

史钧:一句话推荐就是:人类文明没有标准答案,但人类进化自有规律可循。如果要选择我最喜欢的一个段落,我会选书的结尾:“人类确实正在不断远离黑猩猩模式,努力构建安全、和平、自由、开放的新型社会。那里没有雄性竞争的焦虑,也没有军备竞赛的恐惧,彻底摒弃了人工智能的黑暗前景,代之以笑语喧哗、风情旖旎;那里到处都是鲜花和美食、香草和美人,所有美梦都可能实现,所有美景都可以观赏,所有美酒都可以品尝。但见城市街头华灯溢彩、美艳流芳,人们的脸上永远喜气洋洋。只要不是要求太高,我们可以认为那里就是天堂。亲爱的朋友,在黑猩猩模式与倭黑猩猩模式之间,你会选择哪一个呢?你的答案,其实就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”

(图片由史钧提供)

讲述·嘛是天津味儿

规规矩矩做事 生活更有滋味

两代人传承津味儿点心

口述 马恩池 采写 何玉新

在天津人心目中,“点心”一词专指点心铺卖的糕点。主要包括白皮儿、核桃酥、沙琪玛、绿豆糕、蓼花、小茶食等;此外还有马蹄酥、奶油花蛋糕、黄油布丁等西式糕点。马万里、马恩池父子先后担任桂顺斋经理,几十年如一日传承津味儿糕点,实实在在影响了天津人的味蕾记忆。采访中,马恩池讲述了他们父子两代人的故事,也希望能把点心制作的老手艺、老规矩一代代传下去。

父子投身糕点业 制作工艺不能丢

1924年,桂顺斋在南市芦庄子清河街与日租界旭街(今和平路)交口处营业。掌柜的刘星泉曾在北京大顺斋点心铺学徒,回天津单干,做小茶点、糖火烧、小豆粥。两间小门脸房,门口横放两张桌子,店内后面是土灶吊炉,边做边卖。隔壁有一家玉生香,两家南北相连,互相竞争。

我父亲叫马万里,河北黄骅人,十二三岁从老家出来去北京,在大顺斋干过一段时间,还在其他行业干过。因同乡大多在天津,他也到了天

津,经人介绍在桂顺斋学买卖。桂顺斋的点心真材实料,不糊弄人,也特别洁净,生意有了起色,掌柜的又请了几位师傅,添了“京八件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公私合营,我父亲成为国家任用的店铺管理人员,抓业务、抓技术。门店慢慢发展到六间,销售额逐渐增加,又在哈尔滨道与和平路交口开了第二门店,在多伦多开了第三门店。我父亲先是调到和平区糖果糕点公司的基建办当会计,搞基建,后来又去了由冠生园改的向阳基层店。

20世纪70年代后期,桂顺斋恢复老字号,我父亲调回来当经理。店堂年久失修,再加上受地震影响,二楼的过梁塌陷,地板倾斜,成了“破瓦寒窑”,百十来种糕点销声匿迹,售货员无精打采。我父亲把铺盖卷搬进商店,早晨起来打扫店堂,开门营业后跟售货员一起站柜台,晚上,售货员都下班了,他还在不停地收拾。门店营业步入正轨后,桂顺斋又在大胡同九州宾馆后面办了一家糕点厂。

1978年,我高中毕业,分到位于大港区(今属滨海新区)的“大化纤”。我家住南开区烈士路“糕点宿舍”,是我父亲单位分的房,大港区太远了,不想去,便在家长待业。1982



马恩池

年,桂顺斋招工,我自主主张考到门市部。我父亲看见我,二话没说,就把我轰到厂里去了。我不理解——厂里得倒班,怎么也不如门市部轻松。但后来慢慢想通了,父亲是要让我从根儿上学技术、学手艺。

早晨8点上班,我6点多就到厂了。先熟悉配料,然后搅拌、和面、和馅。一张案子七个人,学徒没资格上案子包点心,在旁边打下手。有一回趁师傅们没注意,我坐下包了一个,根本不像样儿。我把它偷偷搁到盘子里,过了一会儿,有师傅看见了就问,这是谁包的,这不是滥竽充数吗!我脸上挂不住,红到脖子根儿,心想,我必须得学会了。在厂里干不了,回家自己练。等我再上案子包点心,师傅

们都夸我,问我怎么练的?真不赖!

我父亲对我的“紧箍咒”还箍着,通过厂里其他人了解我的表现。我工作踏实认真,厂领导也赏识,提前出师,提前晋级,所有点心的制作工艺都刻在我脑子里了。28岁那年,我当了厂长助理,又过了几年,我调到了桂顺斋门市部。

机器劲儿一模一样 而手工劲儿是活的

糕点制作包括“蒸、炸、炉、烤、蛋”五种技术,从生到熟很简单,但操作起来可不然,在选好料的前提下,工艺流程必须按规矩来。就好比炒菜,先搁什么,后搁什么,稍微差一点儿,味道就不对。像核桃酥,很简单的糕点,但很娇气,做好了酥脆,做不好摊大片、大瘪子、塌了、绵了,怎么都不行。必须先拿鸡蛋、糖、水搅拌,再加碳酸氢铵,我们叫“臭起子”。有时候学徒工们胡来,不按工艺流程,几样东西一块放,做出来肯定不行。

技术含量比较高的“油炸活”,沙琪玛最典型。难点在于熬糖,要熬到一定程度,够火候才行。跟季节也有关系,冬季好熬,春夏都不行,尤其是夏天,一般就不做这个了,弄不好就成夹饭了。

小八件,我们叫“皮子”,用面、水、油、酥制成。制馅难度比较大,软了不行,硬了也不行,熬完得能掐断,得有韧劲儿。精细的小八件得拿镊子捏出来,“掐花捏朵”,特别精巧。过去我们参加糕点制作比赛,就做这种糕点。包酥的时候一定要严实、均匀,做出来的点心才能层次分明。

再比如槽子糕,又叫炉元,要用

油、糖、面、蛋,油都在表面,我们叫“香油刷脸儿”。烤好的成品顶部棕红,底部微黄,入口松软,有浓郁的蛋香味儿。

机器能不能做?能。做出来感官好,颜值高,但口感生硬,不绵软,甚至发死、发硬。手工的劲头儿跟机器截然不同,为什么?机器的劲儿一模一样,而人的劲儿是活的。

当年,桃子、玫瑰、绿豆、葡萄干、枣、瓜子仁等辅料,我们都有相对固定的产地,不是赶上什么算什么。玫瑰,我们用北京妙峰山的,产量低,但品质精。小枣选山东乐陵的,掰开能看见果胶质拉出的金丝,所以叫“金丝小枣”。我们选山西临汾的,特别香。葡萄干用新疆南疆的,因为南疆日照时间长,果肉更厚,更甘甜。瓜子仁用的是新疆的“大雪片”。绿豆最早用陕西榆林的,后来榆林绿豆出口量大,咱们买不到了,经过比较,选用了内蒙古赤峰的天山大明绿豆,营养成分高,口感也好。

包括我们用的油,是用湖北的芝麻自制的纯正小磨香油。一打开点心盒子,先闻到香油味儿。但也不能全是香油,物极必反,香油太多“闹得慌”,所以只占四成。

从我父亲那时候就这样:他抓起一把小枣,就知道甜不甜、肉有多少、有没有虫;看一眼江米,就能断定磨出的面色泽如何、黏不黏、出不出数。我也跟他学会了这些绝活。

点心馅我们自己制作,枣泥的、豆沙的、山楂的,传统月饼也有五仁、百果、八珍等馅料。就拿山楂馅来说,蘸糖墩儿的红果做不了馅,我们俗称为“铁果”,得选那种芯是红色的山楂,胶性大,加上糖,加点儿玫瑰,做出来的馅有韧劲儿。

礼尚往来送点心 代代相传食文化

20世纪80年代,有一位顾客,元宵节时到我们门市部吃元宵。吃完一摸口袋,发现换衣服忘带钱包了,便跟售货员解释,并许诺改日送钱来。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,对顾客说:“家藏万贯,难免一时不便,这钱我先替您垫上,什么时候您路过,再送也不迟。”第二天,那位顾客把钱送了来。我父亲说:“又麻烦您一趟。”这都是老年间做买卖的规矩,“生意经”,其实搁现在也不过时,你信任别人,别人自然尊重你。

记得我父亲跟我讲:“我学买卖的时候,第一条就是要在金钱上把控好自己,一失足成千古恨,一定要做到常在河边走,就是不湿鞋。帮忙可以,但不是你的钱,坚决不要,你就老老实实干你的工作。”父亲还给我举例子,“知道过去的铜钱吗?外形是圆的,中间是方的,为什么?中间代表规矩,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,只有规规矩矩地做人、做事、做买卖,财源才能滚滚而来。”

有人说,现在点心的味道不如以前了。这种说法也对,也不对。怎么讲呢?我学徒时,我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,也没有改良剂、松软剂,顶多就是起子;现在原材料升级了,味道比过去更丰富,但添加剂也比较多,所谓“科技与狠活”。就看大伙儿怎么看待这个事了。

天津人爱吃点心。春节期间串亲戚拜年礼尚往来,必须有点心,走在路上都拎着点心盒子。结婚,都得送点心。这些老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。所以,在天津人心目中,点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,也是生活幸福美好、有滋有味的象征,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,也值得我们代代相传。